

以隐为仕 孟浩然

无可无可 王维

隐逸还是闲居 韦应物

中隐 白居易

事与心违始乞身 欧阳修

禄隐 王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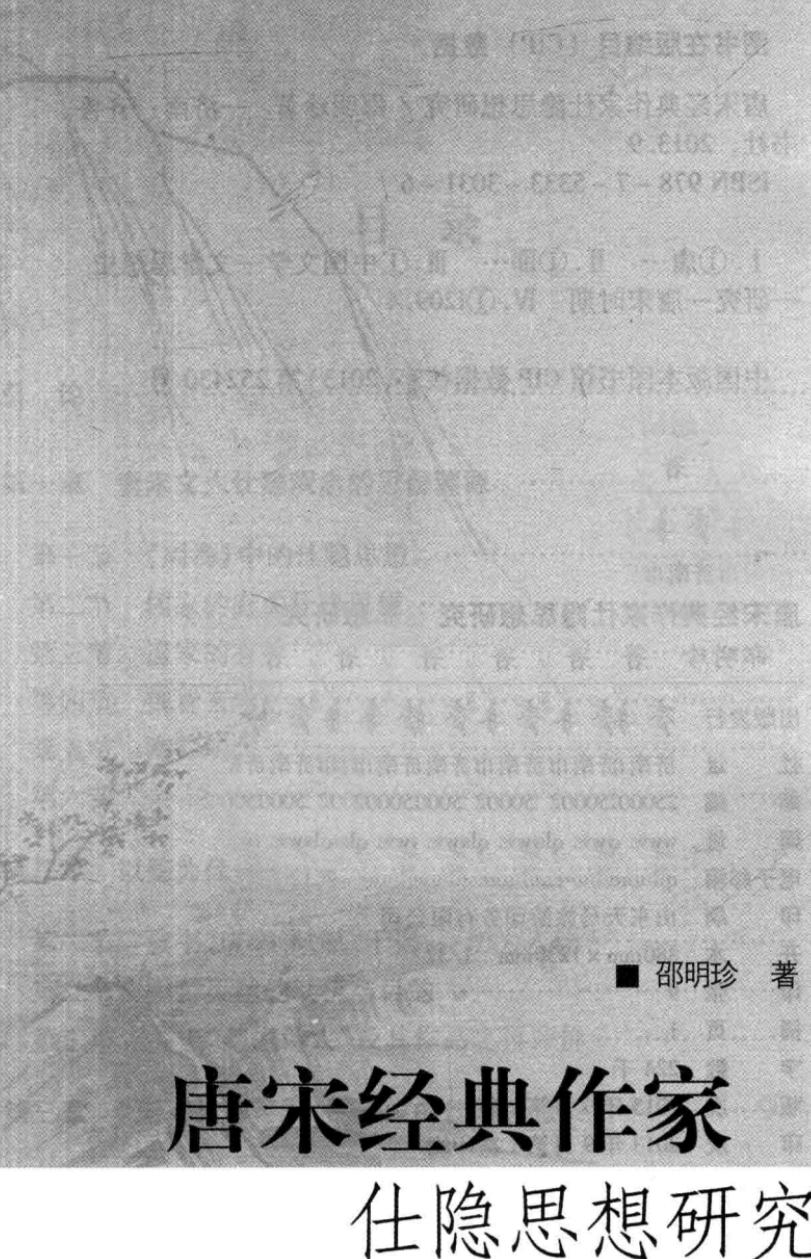
不必仕不必不仕 苏轼

出处俱为累 杨万里

■ 邵明珍 著

唐宋经典作家 仕隐思想研究

齐鲁书社



■ 邵明珍 著

唐宋经典作家 仕隐思想研究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经典作家仕隐思想研究 / 邵明珍著. —济南：齐鲁书社，2013.9

ISBN 978 - 7 - 5333 - 3031 - 6

I . ①唐… II . ①邵… III . ①中国文学—文学思想史—研究—唐宋时期 IV . ①I2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430 号

唐宋经典作家仕隐思想研究

邵明珍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 qlss. com. 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 com

印 刷 山东天马旅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插 页 1

字 数 224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3031 - 6

定 价 2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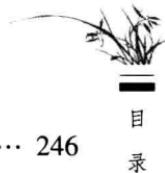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唐宋文人仕隐观念的思想渊源	6
第一节 《周易》中的仕隐思想	7
第二节 儒家的有关仕隐思想	10
第三节 道家的有关仕隐思想	16
第四节 魏晋玄学对唐宋文人仕隐思想之影响	21
第五节 陶渊明隐逸之意义	30
第六节 余论	37
第二章 以隐为仕——孟浩然的仕隐心态	42
第一节 读书、应举、献赋、干谒：一切为入仕	43
第二节 漫游吴越的动机与目的	50
第三节 关于“隐逸诗人”及其作品之再评价	56
第三章 “无可无不可”——王维的仕隐思想	63
第一节 《竹里馆》：历来的误读	63
第二节 “亦官亦隐”辨正	68
第三节 王维的“怀禄”以及“奉佛”“变节”问题辨正	73
第四节 “情种”：王维诗歌的火热情怀	80



第五节 王维仕隐观及其思想渊源	88
第四章 “隐逸”还是“闲居”——韦应物的仕隐心态	95
第一节 “闲居”非“隐逸”	96
第二节 作为循吏之韦应物	108
第三节 关于韦应物诗风之“闲淡”	115
第五章 “中隐”——白居易的仕隐心态	121
第一节 从《放鹰》诗看白居易前期之仕隐心态	122
第二节 忠州起复后白居易之仕隐心态	134
第三节 退居洛阳后的“知足”与“不足”	155
第六章 “事与心违始乞身”——欧阳修晚年的仕隐心态	166
第一节 孝亲与报国：欧阳修仕隐思想之基调	167
第二节 “濮议”“飞语”对晚年欧阳修之打击	176
第三节 王安石排挤说、疾病衰老说辨析	182
第七章 “禄隐”——王安石的仕隐思想	195
第一节 “得禄”“养亲”与“救时”“许国”	195
第二节 “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王安石丰富的仕隐思想	202
第三节 王安石晚年之仕隐心态	212
第八章 “不必仕不必不仕”——苏轼的仕隐思想	217
第一节 东坡之仕隐理想	217
第二节 东坡之仕隐心态	224
第三节 东坡难以归隐之成因	232
第四节 余论	241



第九章 “出处俱为累”——杨万里的仕隐思想及其诗歌风格	… 246
第一节 杨万里特殊的仕宦生涯及仕隐心态	247
第二节 杨万里的仕隐思想	257
第三节 “诚斋体”诗歌风格之成因	261
结束语	… 266
主要引用与参考书目	… 272
后记	… 277

引 论

“唐宋经典作家仕隐思想研究”主要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一、“仕隐”关系之思想观念研究；二、“文人心态”研究；三、经典作家的重新审视及其评价。因此，我们对研究现状之梳理即从此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展开：

“仕隐”关系之思想观念研究在诸多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学史著述中均有涉及，尤其在探讨儒道释三家思想时，都要讨论这方面的内涵。作为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脉思想系统，学界已大致梳理出了其中的基本内涵，可以借鉴。专题性的研究，最早见于蒋星煜先生的《中国隐士和中国文化》（1944年初版，三联书店1988年重版）。近年来，此类论著渐多，如冷成金《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张立伟《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三联书店1995年版）、木斋等《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等。王德保博士的《仕与隐》（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更是从仕与隐这个角度对自先秦到晚清、从孔夫子到李鸿章等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社会理想、行为模式、文化心理诸方面作了历史的梳理，论述有所深入，惜乎面上铺叙过多，个案研究明显不足。

“文人心态”研究也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重视的研究领域，其中以罗宗强先生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罗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和《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



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两部书对魏晋和晚明士人心态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上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引起了学术界对“文人心态”研究之重视。相对而言,唐宋时期的文人心态研究还比较薄弱,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经典作家的重新审视及其评价研究”也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经典作家长期以来都是研究之热点,研究过热,渐渐也有一种被“悬置”的现象,有感于此,学界重提经典作家研究之重要性;二是研究观念、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促成了对经典作家的重新研究和评价。

据此,本书拟综合“仕隐”关系、“文人心态”和“经典作家的重新审视及其评价”这三种研究格局,以“仕隐”思想为观照视角,以“文人心态”为论述途径,最终落实于对经典作家的重新审视和评价。本书之重点在于:以唐宋时期的经典作家为研究对象,选取多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杨万里等为典型个案,试图通过这些经典作家的个案研究,把握唐宋时期经典作家在仕隐思想、个体心理等方面的基本类型和格局。同时,还试图打破传统,以“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的研究观念贴近古人,将古代经典作家还原成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通过对其作品的反复细读,把握其在“仕隐”关系上的独特追求和心理状态,以期对经典作家的研究和评判有所突破。

本书的研究内容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影响唐宋文人仕隐观念之思想渊源。纵观唐宋文人仕隐思想之形成,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均深受先秦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种种学说、思潮之影响,尤其是先秦的《易经》以及儒、道两家有关隐逸思想的阐释,为后世文人的仕隐思想定下了基调。唐宋文人的种种思想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仕隐心态几



乎均可以从前代的有关思想中找到源头或者依据,充分体现出这一脉思想的绵延传承。魏晋玄学及陶渊明的思想观念及其处世哲学也深刻地影响了唐宋时期文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二、在从思想史角度作出整体梳理的基础上,着重选取唐宋时期典型的文人个案,通过这些典型个案的深入探讨,清理出他们在仕隐观念上各自的思想内涵和个性特征。如王维“无可无不可”的思想内涵及对他处世行为的影响,白居易的“中隐”思想、苏东坡的“不必仕不必不仕”、王安石的“禄隐”思想等,并试图通过这种典型个案的研究,整理出影响唐宋时期文人心态的整体思想状况和理论内核,从而深入把握作为传统文人之核心思想的“仕隐”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基本内涵及其影响。

三、从仕隐观念入手,通过对个体作品的深入研读和把握,来理清经典作家个体的独特心理状态,尤其是在“仕隐”矛盾中的特殊心态。比如王维,盛唐文人大都崇尚隐逸,但大都是以隐求仕,李白、王维、高适等莫不如是。对王维的几度隐居以及诗文中屡屡提及的对归隐的无限向往,也当作如是观。王维性甘淡泊,爱好自然山水,向往归隐是性之使然。但是,王维又是一个深受儒学教化的封建士子,生逢盛世,他的思想深处也有盛唐文人普遍具有的济世、忠君、孝亲思想及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所以在情感的层面上,他渴望隐逸,而在理性的层面上,他又最终否定了隐逸,这完全符合王维的性格和生活状况,既合情又合理。再如白居易,他既有“忠直”爱民、勤劳公事之一面,又有“颓惰废放”的另一面;既有“省分知足”之一面,又有“爱官职”、“羡慕”“富贵”之另一面,将两者结合起来看,更能概见白氏之全貌。同时,白居易晚年虽然有“省分知足”之一面,也对富贵有所羡慕,而其本心更有渴望“安人活国”却不能才尽其用、只能在闲废中老去的无奈,其内心也有着深深的“不足”;而他时时自咏如何的闲适、如何的自在、如何的乐天知命以及栖心佛老、放浪

山水、沉溺诗酒，其实正是其自我排遣、自我安慰的一种手段。本书正是通过这些个案心态的研究，希望能更真切地把握唐宋文人独特的处世哲学和心理态势。

四、本书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在“仕隐”思想的梳理和文人心态把握的基础上，对唐宋时期经典作家或局部、或整体的重新评价。比如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历史上褒贬不一，颇多歧见。作为一个非常之人，王安石有着非凡的抱负，也有着非同常人的君臣际遇，其主持的熙丰变法的大业虽然未能最终取得成功，但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一生建立的功业，与他所一贯坚持的仕进之准则是分不开的。在仕与隐的问题上，他不以“迹”求，视出、处为同一。在不得已时“得禄”以“养亲”，而出仕之后，也不轻易干求，坚持“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最终得遇于时，获得了历史上少有的际遇。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施泽于天下”，其理想乃是“才成霖雨便归山”，所以在难以有所作为之时，便断然离开朝廷，真正做到了“难进易退”，忘怀得失，自甘淡泊。王安石在个人的操守上所表现出的是宋代很多士人共有的高风亮节，这既决定了他一生的非凡功业，也造就了其非凡的人格魅力。正因为此，同时代的苏轼等人虽然与他政见不同，却彼此钦慕，互相推重。认真梳理王安石在仕进、进退问题上的丰富思考及其复杂的仕宦心态，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研究王安石其人其作。又如孟浩然，对孟浩然“隐士”、“清高”的评价几为学术史上之定评，但事实上，初盛唐士人入仕的几大途径——应举、献赋、干谒、为仕而隐，孟浩然都走过。积极求仕，贯穿了他的一生，一直到因病去世的前几年，还写下了著名的诗作《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表达出强烈的出仕愿望。所以，与盛唐的其他诗人如李白、王维、杜甫、高适等著名诗人一样，孟浩然也是深受盛唐时代风会的影响，一生都怀有积极入世的强烈意愿，至死不曾真正放弃过仕宦之想，既

不是什么隐士，也谈不上什么“清高”，甚至其内心深处也没有强烈的“仕与隐”的矛盾。孟浩然自己并没有想真正成为隐士，事实上也不是什么隐士。“清高”、“遁世”云云都不符合实情，而我们从“隐士”、“隐逸诗人”出发，将其框定在“田园山水诗人”这样的领域加以研究，显然不是准确解读孟浩然及其作品的真正途径。

本书就是以这些经典作家的个案研究为主体，以“仕隐”思想为视角，以文人心态为途径，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研究来反映唐宋时期文人的独特面貌，并希望通过这样一种途径，对经典作家之研究有所推进。

第一章 唐宋文人仕隐观念的思想渊源

综观唐宋文人的心态史,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仕与隐”的矛盾。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的再版后记中说:“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局的变化。在中国古代,有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却不多。隐逸情怀是人生的一种调剂,而真正的隐士却要耐得住寂寞。”^①在该书正文中又谓:“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方面,是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生活出路。现实的生活状况是决定一个人的心境的非常实在的因素。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看明代嘉靖以后的士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也为屡试不第而苦恼,但是那苦恼又很快消逝。因为他们并非只有入仕一途。他们还有其他的生活出路,可仕可商,可卖文卖书卖画,他们还有生存的广阔空间,有人甚至还可能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②有关政局之变化、生存之状态,笔者将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做具体分析探讨。在本章中,我们拟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唐宋士人仕隐思想之渊源,作一些粗浅的考察。纵观唐宋文人仕隐思想之形成,乃深受先秦两汉以及魏晋六朝时期的种种学说、思潮之影响,尤其是先秦的《易经》以及儒、道两家有关隐逸思想的阐释,为后世文人之

^① 罗宗强:《关于士人心态研究——〈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研究〉再版后记》,见《因缘集——罗宗强自选集》,第1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罗宗强:《因缘集——罗宗强自选集》,第1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仕隐思想定下了基调，他们的种种心态、想法，几乎都可以从前代的有关思想中找到源头或者依据，由此充分体现了这一脉思想的绵延传承是如此的源远流长。

第一节 《周易》中的仕隐思想

在探索唐宋文人仕隐心态的思想源流时，不能不关注《周易》。关于《周易》本经的编撰者历来众说纷纭，关于《易传》的作者为孔子说也大都不为今人采信。有学者认为：“关于《周易》本经的作者，尚不能有确凿证据断言其究为何人，至多只能‘原则’地说，他或可能是中华上古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社会地位较高的巫，是他或他们发明了阴爻、阳爻，创造了八卦、六十四卦及卦爻辞（巫筮记录），撰编了《周易》本经。而《易传》的作者，据《易传》之基本文化思想与思维大凡属于儒学范畴这一点可知，他们可能是孔门后学。”^①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十分看重《易》，因此从其思想之影响而言，儒家学派与《易》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文人研治《易经》并以此名世者尚不多，但到了宋代，欧阳修、王安石、三苏以及诸多理学家几乎都是易学家。《易经》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早期的隐逸思想，对后世之影响颇为深广。

有关隐逸思想的论述，《易经》以及《易传》等解释文辞均有述及。如乾卦：“初九：潜龙，勿用。”《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②王振复《周易精读》释曰：君子好比“潜龙”，时机未到，隐居不出，不可妄动，是因为犹如初阳在下，处境不利的缘故。^③同书又谓：“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

^① 王振复：《周易精读》，第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35页，齐鲁书社2009年版。

^③ 王振复：《周易精读》，第52~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①此一思想对后世尤其是宋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远。

再如乾之九三：“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脩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②高亨先生认为：“君子预知其将发展到某种地步，从而努力为之，作到某种地步，知之不误，行之有恒，是可以谈事业之几微矣。”

又如否卦，“《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③。“《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④高亨注曰：“按《象传》以天比君上，以地比臣下。天地不交象君臣上下之情隔阂而不相通。此乃国家之否。君子观此卦象及卦名，当国家方否不可进仕之时，从而崇尚俭德，以安贫贱，以避祸难，不为利禄所诱惑，而苟图富贵。”此指倘若有对君子不利的情况，所谓“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荣以禄”，应该适当隐退。

《易经》中关于随时而动、与时消息之思想，尤其是《周易·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王安石“出处之适其时”^⑤、“待时而后动也”^⑥思想之产生正是受

① 王振复：《周易精读》，第 56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 42~43 页，齐鲁书社 2009 年版。

③ 同上，第 124 页。

④ 同上，第 125 页。

⑤ [宋]王安石：《贺韩魏公启》，《王文公文集》，第 25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⑥ [宋]王安石：《致一论》，《王文公文集》，第 34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其直接启发。其《上蒋侍郎书》书说：

某尝读《易》，见《晋》之初六曰：“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此谓离明在上，己往应之。然处卦之初，道未章著，上虽明照而未之信，故摧如不进，宽裕以待其时也。又《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此谓九五居中，为上下之主，众皆亲比，而已独后期，时过道穷，则人所不与也。斯则圣人赜必然之理，寓卦象以示人事，欲人进退以时，不为妄动。时未可而进，谓之躁，躁则事不审而上必疑；时可进而不出，谓之缓，缓则事不及而上必违。诚如是，是上之人非无待下之意，由乎在下者动之不以时，干之不以道，不得中行而然耳。

夫读圣人之书，师圣人之道，约而为事业，奋而为文辞，而又胸中所蕴，异乎世俗之所尚，凡闻当世贤公卿大夫之名，则必蕲一见，以卜特达之知，庶乎道有所闻，而志有所展。其于进退之理，可以不观时乎？^①

《禄隐》谓：“《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君子之无可无可也。”王安石《九卦论》又谓：“《易》曰‘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并以辨义，巽以行权’，此其处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学，至于是则备矣，宜其通于天下也，然而犹困焉者，非吾行之过也，时有利不利也。”可见，王安石明确将《易经》的有关思想作为其出处进退之指导准则，《易经》对他仕隐思想之形成可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易经》隐遁之理解，王振复认为：“遁卦教人隐遁、谦退而自守，通先秦老庄哲学之义理。”^②李笑野认为：“《周易》……隐逸的本身是出于对社会的热情关怀，对理想社会状况的自觉追求，对人

^① [宋]王安石：《上蒋侍郎书》，《王文公文集》，第25~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② 王振复：《周易精读》，第18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格独立与自由的护卫,避浊世、小人对自己的无端戕害,而绝非高标自许,否定社会本身。”^①此一认识不无见地。后世如白居易之退居洛阳、王安石之一再辞去馆职、苏东坡之渴望归隐,皆是在时机未到或者不利的情况下做暂时的敛藏或者退避,由此维护自己人格之独立与自由,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其本身就是“志在辅时”,是积极入世的。这一特性,在他们深受其影响的思想源头——《易经》那里早已有了明确的阐述。

第二节 儒家的有关仕隐思想

前人对唐宋士人仕隐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从我们所选取的几个个案来看,最根本的还是孔子、孟子的有关思想。“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无可无不可”等观念几乎为后世文人所普遍接受。

一、孔子的仕隐思想

孔子的仕隐思想在《论语》里有很丰富且多方面的表述。

孔子教导学生的目的是从政,是治国平天下,但也不讳言“干禄”:“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②此处明确教导子张如何干禄,而并没有认为干禄是什么可耻的事。他也不讳言“求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虽然孔子也说过“三年学,不至于谷,不

^① 李笑野:《〈周易〉的隐逸思想探论》,见羊列荣编《诗书薪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荣休纪念文丛·蒋凡卷》,第1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清]刘宝楠撰:《论语正义》,第6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以下有关《论语》引文均出自此书。



易得也”(《论语·泰伯》)这样的话,意为三年求学却不存在做官求俸禄的念头,是相当不易的。在《卫灵公》一篇则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志在“谋道”,一心问学,就必然可以得禄。

孔子不讳言干禄,也不讳言求“名”,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子罕》篇曰:“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可见孔子自己也是渴望出仕行道,只是他并不轻易出仕。在他看来,邦国无道而出仕做官求取俸禄是可耻之事。《述而》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道”与“义”是其出仕、求取俸禄的前提。因此,“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成了孔子仕隐思想中的又一重要内容:“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有“道”与否是其出仕与否的重要前提条件。这是一层意思,而即使碰上邦国“有道”之时,是否可以出仕,是否为邦国所用,也不是士人自己就可以掌控得了的。因此,“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成了孔子自己乃至后世大量有志之士共同奉行的一条重要行为准则:“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与孔子一样可以做到“用行舍藏”,因为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要固守贫穷,耐受寂寞。所以,孔子曾经感叹:“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